

# 国际关系的中长期发展趋势 与中国的应对（一）

■ 王逸舟 / 文

本文主要对国际关系的中长期发展趋势做出分析，同时探讨世界政治中存在的若干重大不确定因素，最后对中国的应对方略提一点看法。

## 国际关系的中长期发展趋势

趋势一：国际制度的网络化进程强劲有力，越来越密集覆盖至全球各个角落及领域。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初联合国诞生以来，国际制度一改过去几百年间那种可有可无、若隐若现的状态，其存在变得比较明显，其功能变得更加有效。尤其是冷战结束、两极对抗消失之后的最近20年间，传统的冷战思维和集团对抗方式受到广泛批评，而有助于代表多数国家和地区意愿的各种国际制度和规范逐渐活跃起来<sup>[1]</sup>。例如，在国际贸易领域，人们见证了世界贸易组织的诞生及其日益明显的作用，尤其是后多哈回合进程中国家间经贸诉讼判决的冲击力；在国际军控领域，有全面禁止核武器试验公约的出台，有国际原子能机构之不可忽视的调查取证、咨询建议角

色；在气候变化与环境保护领域，先有《京都议定书》，后有“哥本哈根进程”的强力推进<sup>[2]</sup>；在海洋国际关系领域，世人见证了被称作“海洋大宪章”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生效，看到它对新一轮“蓝色圈地运动”的制约；在国际政治和人权领域，产生了《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潜移默化地约束着世界多数国家的立法和司法进程；在解决各种地区热点和局部冲突的集体安全领域，联合国安理会越来越像是主要世界大国不敢轻视的一个协商伙伴和决策角色。未来的十几年乃至几十年间，这一趋势将持续加强，更加细密、更加有力地渗透到世界各个角落和国际关系的各个方面。比如，在国际和各国食品安全领域，联合国食品法典委员会越来越多介入，提出了有关食品安全的指导性意见；在打击跨国间有组织犯罪的问题上，联合国“毒品与犯罪办公室”已经开始定期发表报告，协助或施压各国政府的相关工作；在国际水域，类似《防止海洋油污公约》、《防止船舶污染国际公约及议定

书》的国际法，对于规范全球船舶业的环保态度和措施，正在发生日益增大的约束力；在各国使用地雷的考量上，已经生效的《禁止地雷公约》（即“渥太华公约”），势必形成对目前尚未签约的少数国家的强大压力，令后者不得不朝着减少地雷使用的方向运作。虽然少数大国一直力图干扰或操纵国际制度，包括中小国家在内的各种国际利益集团的博弈也从未中止，各种国际制度和组织内部的官僚化和惰性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制度与组织的效能，然而总体上判断，国际制度的网络化进程不可阻挡，覆盖面将不断加大（比如从传统的高政治领域扩展至低政治范围），执行力度特别是履约强度可能逐步提高，对主权国家的权力和各国民众的生活均将产生更加深刻持续的影响。看起来，国际制度的兴盛和强化，是对民族国家主权的约束；其实，善用国际制度、顺应时代浪潮的国家，能够从国际制度网络进程中获得诸多利益，包括主动让渡边缘性主权权利的同时增强自己对于核心主权权益的掌控。国际制度与

国家主权之间并非线性的此消彼长关系，而是呈现复杂的组合与互动，国家权力的弱化或强化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决策精英审时度势、运筹帷幄的眼界和能力。

**趋势二：国际制度改革提速，新旧交替矛盾加剧，争取话语权的博弈更加复杂多样。**

国际力量发展不平衡的局面，正如列宁很早指出的那样，在资本主义列强统治世界的几百年间一直存在，主要表现为主要西方国家之间争夺市场和资源、控制资本流动和收益、掠夺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彼此实力消长与斗争。然而，在新的时期和背景下面，发展不平衡的命题具备了更加积极的内涵与衡量尺度。就国际制度的演变而言，未来中长期时段内，有几个突出的特点：

其一，从基本目标分析，非西方世界的一批大国（如俄罗斯这样的转型国家和中国、印度等来自发展中世界的国家），凭借自身综合国力的稳步提升，力图向国际政治舞台的中心逼近，逐步改变传统西方国家长期主宰各种重大国际制度的局面；而传统西方霸权国家（欧美日等国居核心位置）则千方百计维持旧的格局，包括打压非西方竞争者，以避免主导权的旁落。考虑到传统与新兴国家实际存在的各种差距，尤其是后者崛起过程的诸多不确定因素（困难与危机），不同势力此消彼长的摩擦会不断加剧，而取代过程则漫长曲折<sup>[3]</sup>。这中间，不能排除一些新兴大国中途受挫、停滞不前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传统西方强国重振强势、引领新一轮竞赛的前景。曾在20世纪80年代发展迅猛、又曾经在90年代后期被亚洲金融危机重挫锐气的印度尼西亚，便是

前一类典型事例；美国在越南战争的后期，也曾经有过相当低迷的一段，但随着海湾战争的全胜和克林顿执政时经济荣景的出现，“山姆大叔”似乎依旧强大无敌。看大国综合国力竞赛，切忌用简单的加减法计量。

其二，从新旧交替方式看，一种可能出现的方式，是形成各种新的区域性力量中心，这些同时包含西方强国和新兴大国的力量中心，在某些地区强国（中东欧的波兰、西亚的土耳其、南部非洲的南非、中南美洲的巴西和墨西哥）的强力引导下，将依托本区域的经贸一体化和文化向心力，建立和发展一批区域性国际标准和制度框架（如欧盟法律框架、东盟安全共同体、西非国家贸易同盟、拉美能源合作机制等），对原先国际间行用的相关制度规范形成挑战或加以修正；另一种出现几率相当大的方式，是在全球范围调整原有国际制度的结构，重新分配投票权、资金存留比例、领导人国别来源或其他决策份额，经过长期而艰难的斗争较量，包括各种结盟与分化的手段，逐步使各种全球性国际组织和规范适应新的力量格局。

其三，从主要领域观察，在全球层次上，国际制度的三大方向性改革，将持续受到各方面的关注与投入，即在政治和安全领域，联合国机制的变化，特别是安理会结构的改革，以及安理会所决定的集体解决国际冲突与维持和平的方式，将成为未来十年不同力量和声音较量的一大平台；在经贸和环境领域，以八国集团和二十国集团为主要象征的传统西方大国和新老国家并存的两类国际机制，包括受到它们左右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机制的调整过程，将以互补、合作和竞争、

超越的双重博弈，通过复杂的磨合进程，在长期的此消彼长中，共同制约全球的可持续发展；在文化与社会领域，以联合国宪章和“人权公约”、经社理事会与教科文组织为主要体现的国际文明制度及其规范，在被各国越来越多地利用来解释本国的政治制度、文化战略、外交方针合法性的同时，自身也将不断地得到各种充实、修正和完善，成为更加显著与有效的全球性伦理价值与国际法来源，有形无形制约着世界范围各式民族主义、“文明间冲突”、新生态政治和重大社会思潮的起落。

**趋势三：在国际制度的生成演进中，乃至整个国际体系的变迁过程中，经贸、外交、法律的作用增强，军事的优先性有所下降。**

刚刚过去的20世纪是主要国际制度诞生和作用的世纪；它的重要特点之一是，针对两次世界大战和若干重大局部战争的严重后果，战争与和平问题始终是各国决策者和民众关注的首要事项，与此相应国家间军事关系保持了在国际制度创造过程中的优先位置。一战后建立的国联和二战后诞生的联合国，作为全球最大最重要的国际组织和法律制度，目标旨在防止两次世界大战的悲剧再度发生；联合国系统中的多数国际制度与规章，如国际原子能机构、安全理事会、人权委员会和难民署以及维持和平行动，占有了大多数国际资源和排在各国政府议事日程的最前面，成了国际社会关注和国际组织活动的绝对重心。不过，从各方面因素综合分析，今天和未来一段时间，在上述逻辑继续有效的同时，有不少新的线索出现和新的要素介入，令国际制度的生成与变迁过程呈现多元、非线性的新特点。

首先，外交民主化浪潮正在席卷世界各个地区，政府不得不适应社会公众更大知情权的要求并做出一定改变，NGO在国际组织和各种论坛上的发言权得到增强，信息的迅速传播和新媒介的层出不穷削弱了国家权力的某些垄断。因此，可以说，新的社会运动和思潮加入到国际制度制订和修改的有力参与者之中。典型事例如NGO在国际禁雷公约和对中小武器的管制加强过程中的角色。

其次，经济全球化和地区经贸一体化的势头日益强劲，世界各国经济贸易和生活方式的紧密联系（包括生产过程、消费偏好、融资流动之相似性的增强），从积极意义讲，无形中加大了各国之间尤其是主要国家之间发动战争、以武力解决问题的代价，外溢出政治对话、军事缓和、军备控制的效果<sup>[4]</sup>。联合国秘书长在解决地区热点事务中调解作用的增强，安理会决议的特定威慑力和道义影响力的提升，各个地区联盟的安全对话与协调的密集化，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世界经济政治化、世界政治经济化的更大互动。

再次，由于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从长时段观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尤其是冷战终结之后，国际制度乃至总体国际关系的一个进步趋势是，各种军事霸权、政治威权、外交强权虽然没有消失<sup>[5]</sup>，某些时候甚至强势显现，但它们受到的有形无形的约束在增多，优先性和权重均有所下降；这方面，美国给出了最好的教训：这个超级大国在军事上依然是超群的，它干涉世界各地事务的愿望和能力依然强烈而有力，但美国在军事战场之外的失败到处可见，支撑美军战斗力的财政资源受到更多约束，

来自联合国和其他大国的制衡越来越明显，最近半世纪里几乎每隔一二十年美国介入全球大型冲突的能力就要降低一个层次（从宣称“同时在两个半战场作战”，到“同时在两个战场作战”，直至近期所说的“同时在一个半战场作战”），而“软实力”、外交的重要性等因素被迫放在更高的位置。从全球社会与国际关系看，国际性法制的重要性正在获得更大重视（如履约程度的提高、国际法的相对增强、国际法覆盖面的不断扩大），“社会与国家”关系中前者的声音相对而逐步提高，公民个体的权利和整体的社会力在国际和平与发展（包括制度演进）中的作用正在上升。不管存在多少不如意之处，这个演进线索是可以觉察与追踪的。

**趋势四：在世界各国综合国力的竞赛中，领土主权、政府权力、自然资源等传统因素继续有效的同时，技术进步、产业先机、“脑力风暴”等后发因素作用上升。**

仔细追踪不难发现，当代国际关系和国际制度里一如既往存在着激烈争夺、“下先手棋”的局面，只是这种较量在不同时期和领域有着不同的方式与表现。这里只从三个角度略作透视。

其一是地缘政治学说的不同阶段与特征。近代早期有人们所熟悉的有所谓的“陆权论”，即先手控制大陆战略要津的理论；著名者如麦金德的格言：“谁统治东欧，谁便控制心脏地带；谁统治心脏地带，谁便控制世界岛；谁统治世界岛，谁便控制世界。”<sup>[6]</sup>19世纪又有美国海军军官马汉提出的“海权论”。它的基本构思是：海洋是那一时期列强占据殖民地争夺有利位置的主要空域，国家的地理位置

尤其是海岸线的长度，尤其是一个国家对于制海权的重视程度，决定着这个国家在国际体系的重要性和农业发言权<sup>[7]</sup>。20世纪前半叶，西方一些地缘政治学家通过对飞行器技术改善造成的后果（如机动性的大大增加、地形障碍重要性的下降、前后方区别的模糊等）的考察，创立了新的“空权论”（制空权学说）<sup>[8]</sup>。由此推导不难发现，21世纪综合国力竞赛，将在更高、更大、更深的地球空间展开，深海、大洋、极地或外空可能体现出传统领土主权和政府权力的延续与超越；用美国已故总统肯尼迪的话讲，“谁占据了高边疆，谁就占据了国际主导位置”。

其二是能源开发的不同途径与思路。尽管工业革命至今，以煤炭、石油、铁矿石、铜矿石为代表的天然矿石资源，一直是各国发展的主要能源动力，然而新的趋势已经显现，那就是核能、风能、水利、电池板、潮汐能、太阳能等清洁和可再生的动力源，在开发利用方面有更值得重视的远景；换句话说，从中长期角度观察，不论大小国家，只要率先掌握高效和便于储存的可再生能源，就有可能在综合国力的长期较量中占据有利位置，发挥出自然幅员和人口规模的国际作用。

其三是“熊彼特命题”的启示。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提出一个重要思想，即：竞争的本质是一种创造性破坏，不论产品、工艺、生产方法或科学技术的创新，乃至社会生产方式的更迭，都是对从前同类的某种打破和推翻，是在此基础上的超越与再造<sup>[9]</sup>。“熊彼特命题”促使人们用全新的角度看待诸如金融危机、经济萧条、发展停滞或企业倒闭等不利现象，并推而广之地用这种思维对待任何表面糟糕的事物与进程，从

中寻找“危中之机”和发现新的制高点。也就是说，谁能在当下的问题与矛盾中找到解决它们的突破口，创造性地把自己的劣势、困难转化为优势或先机，谁就可能在竞赛中后来居上，在新时期立于不败之地。总之，谋划新时期的国家大战略，必须有新的思路与手笔。超出狭隘地域的高边疆，可再生的新能源，持续而创造性的破坏，便是新世纪的这类制高点。

**趋势五：国际行为体不断增多，国际体系呈现“分层化”和“碎片化”动向。**

虽然眼下讨论的是国家中长期战略问题，但这种战略的决策者和分析者都必须懂得，新时期的国际体系和国际关系正在出现以往时代不曾有过的许多重大改变，国家战略的设计与实施应当适应这种改变。其中之一，是国际行为体的数目在不断增多，涉足面在不断扩大，其影响力在不断提高；虽然尚不能撼动民族国家和由各国政府组成的国际组织的主导地位，这些非国家行为体加快了国际体系的分化、改组和再造，使其呈现“分层化”、“碎片化”动向<sup>[10]</sup>。

在世界经贸领域，各种各样的跨国公司正在改变全球经济版图，甚至有意无形中支配、“绑架”一些政府的外交和军事政策。它们中有的庞大无比、富可敌国，有的控制能源阀门或核心技术，有的改变着各国的品味偏好，有的塑造着多个国家的产业集群。在世界社会和生态领域，相当多的非政府、非营利的组织和团体，加入到联合国为中心的各种重大论坛，在政府间峰会外召开各种“会边会”，不仅以“打擂台”方式冲击传统的国际议事日程，更试图用行动证明它们的目标并非虚言。哥本哈根联合国气

候大会业已表明，国际 NGO 的崛起已是任何国家和正式国际组织不可轻视的挑战。在世界军事和安全领域，尽管各国政府尤其是大国政府仍然垄断着尖端技术和主要军备力量，但显而易见它们不得不面对越来越多的非政府的挑战者和竞争者——国际恐怖主义势力和跨国犯罪势力试图掌握更多的财政资金和攻击手段，改变某些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生态与安全庇护；一些反核、反大坝、反地雷的国际 NGO 正在全力推进它们的目标；一些国家的公民社会运动与和平主义抗议力量，对所在国家政府预算的军事部分提出有力质疑和各种约束。在全球宗教和文化领域，形形色色的原教旨主义回归、反原教旨主义努力相互激烈争夺，血缘、民族、部落、教派、“文明”的各种认同都在抢占自己的地盘，这些争斗有相当部分跨越了主权国家国界和政府控制范围，构成未来一段时期国际格局下各国政府不得不顺势而谋的强大潜流<sup>[11]</sup>。如果说传统国际体系的行为体数量有限、行为模式可预期的话，人们现在再也无法对新的国际体系中的行为体做同样的判断：它们的此消彼长速度太快，它们的互动方式太难预测，它们对国际格局的冲击也变得更加诡异和难于应对。无论如何，它们使得 21 世纪的国际体系发生着更大更明显的层化过程，使得看上去曾经相对简单的国际关系格局呈现日益裂变、碎片化、多元而复杂的局面。这种态势很难用“好”“坏”的价值判断，很难用单一的方式应对，但它却是我们必须面对的某种新现实。几乎可以肯定，离开对于这种新现实的观照与考量，任何国家的大战略都不会取得真正成功。

进入新世纪的国际体系，越来越

像一个三维立体结构：它不光有显著粗大的国际政治、外交、军事、安全的传统架构（第一层面，也叫“高阶政治”），还有日益强劲有力的国际经济、贸易、能源、资源、金融和物流的新型架构（第二层面，通常被称作“低阶政治”），更有不断崛起、更加活跃的国际社会、文化、宗教、媒体、出版、艺术、教育的新型架构（第三层面，不妨称之为“新社会力”）；上面讨论的“分层化”和“碎片化”现象，最常见的就是发生在第三层面上，而且由于这些现象的显化，“国际社会”再也不是一个抽象空洞、无法认知的概念，相反成为任何国家（包括最强大的国家）必须考虑和应对的给定环境。

**趋势六：世界政治地图更加复杂多样，独立国家的数目保持增加趋势，而民族与国家关系的复杂走向决定着衍生的规模和裂变的速率。**

联合国诞生至今的六十多年历史，从一个侧面提示了世界政治地图的不断改变趋势：这个全球性国际组织在建立之初，只有 51 个主权国家成员；到中国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初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时，它不过百十个会员；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 80 年代末期 90 年代初期，联合国的会员数目在 150 个左右；如今，联合国的正式成员与正在申请加入它的主权国家总数近 200 个。联合国成员数这种加速度、跳跃式的增长，不过是当代全球化进程催生和推动下国际体系不断“层化”的一种表现，是我们这个主要由主权国家组成的世界格局在世纪之交受到民族关系“元素化”冲击的一种结果。

前面已经分析过“层化”现象的成因，这里主要讨论一下“元素化”问题。众所周知，近代民族国家体系

诞生以来,先后出现了几次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的高潮。第一次是19世纪中叶前后,在资本主义逐渐兴盛的欧洲,曾长期受教廷摆布和少数大国强权支配的一批欧洲国家脱颖而出,建立了自己的民族国家(如德国);第二次同样发生在欧洲,这次是在传统的边缘区域——巴尔干和东南欧,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硝烟散尽而产生了一批中小独立国家;第三次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的五六十年代,一大批亚非拉国家在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废墟上宣布独立;20世纪90年代的冷战格局终结,导致又一批非主体民族(尤其在中东欧地区),挣脱掉传统集团势力的绳索,建立了主权国家——最近的这次进程尚未结束,裂变的潜流还在涌动(如前南地区的科索沃,俄罗斯联邦内部的车臣、印古什等北高加索地带)。造成这种不断裂变、国家数目增多的深层次原因,不仅是某些国家旧时的压制性政策造成离心倾向,更在于全球范围民族问题风向标的变化。20世纪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多元民族组成的联邦政体是受到大力推崇的,多民族国家被认为具有更大的发展优势和潜力(美利坚民族的“熔炉”示范效应便是典型)。这种曾经广泛持有的认知,包括大量主权国家的政治实践,在20世纪中后期开始受到质疑,在苏联解体后更直接受到抨击和挑战。反其道而行之的,是民族关系及实践中的某些原教旨主义滋生、坐大和泛滥,这些原教旨主义形形色色,但共同点之一是强调本民族、部族、甚至教派、血缘、语言、文化传统的纯洁性和高尚性,并且在对比中贬损、降格其他的民族、部族、教派、血缘、语言和文化传统。这类比较偏狭、极

端的民族主义思潮,在行动纲领层面表现为反对联邦政体和或任何多元一体式的政治安排,质疑多民族国家体制的优点,力主在更加单一(它们所谓“纯洁”)的民族、部族、教派、血缘、语言、文化传统基础上,建立更加独立或自治的政治体制和管理方式。不用说,很多国家政府在综合治理上的失败,包括压制性的、不公平的内部民族方针,是这种思潮和政治纲领的催化剂;而当今世界各种民族与各个国家的不重合,则是孕育民族国家裂变种子的“天然土壤”<sup>[12]</sup>。我们现有的国际体系里,只有不到200个主权国家的席位,而它们名义上代表和容纳的各种大小民族、部族,数量超过上千个;例如,单是前苏联一国内部就有120多个民族,前南斯拉夫联邦内部也有近30个源头各异的民族,非洲第一人口大国的尼日利亚内部有着数百个历史传统不一、相互关系复杂的部族。全世界近200个国家中,三分之一是单一民族构成的国家(如波兰、日本、韩国、以色列等),绝大多数国家是多民族组成的政治国家。在世界政治的基本结构、重大潮流和基本符号有利于多民族国家的体系安排时,如20世纪70年代之前,民族分离主义和各种极端主义诉求就处于不活跃状态;一旦国际氛围扭转,譬如说大的霸权体系分崩离析,曾经弱小或受压制的民族(部族)及其政治上的代理人就开始大行其道。而世人在21世纪初见证的,恰恰是一个对多元民族国家体系及思想基石带来重大挑战的时期,一个至少还会延续一二十年的复杂过程。

**趋势七:**在国际冲突领域,世界大战的可能性持续下降,尤其是大国间的全面对抗不易出现,另一方面,

地区热点和局部战争却很难有效遏止,内战外溢的局面可能增多。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和核武器的出现,给主要大国之间的军事对抗带来全新的局面:一方面,“胜家通吃、败者输尽”和完全置对方于死地的思维发生重大改变,核武器更多用于威慑目的而非直接的战场攻击,由主要大国之间的战争而引发世界大战的可能性相对下降;另一方面,国家之间的权力利益争夺和意识形态较量并未减少,通过代理人进行的局部战争和热点冲突时有发生。苏联的解体、冷战的结束和美国作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之霸主地位的确立,在世纪之交带来国际体系和全球规则的重大转变,其中之一是人类被核武彻底毁灭的可怕场景随着两极对峙的终结而消失。不过,冷战时代形成的国际冲突格局(所谓“大战不犯、小战不断”)并未因此而中止;今天和未来相当一段时期里,由地缘政治、地缘经济的角逐和各种国际行为体之间的争斗引发的小规模战争仍有可能不断出现,围绕出海口与水道控制、资源稀缺或粮食短缺、部族积怨及教派矛盾、种族歧视或宗教差异、恐怖主义与核扩散问题等展开的危机可能上升到武力对抗的地步。往中长期展望,世界大国和地区强国之间虽然将尽力避免全面战争对抗,但在某些地点和问题上实施“外科手术”打击、“拔钉子”战役、“先发制人”攻击的可能性完全存在,特别是各种矛盾的结合部(要害区位)、在所谓“不同文明圈的分界线”上、在危机可控和代价有限的范围。从国际战略设计角度观察,今后一二十年内,各大国的战略设计思路也会发生相应调整与改变,即:更加重视消除多样性的非传统安全威胁,着力发展

各种特种打击力量和功能性的装备；更加重视危机的预防与管理机制，避免在突发性事件面前手足无措；更加重视对不同国家地区的战略文化和族群心理的研究，防止类似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出现的“战场上打赢、战场外打败”的尴尬困局。世人见到的是一幅看上去有矛盾、实际是某种新趋势的画面：主要大国之间高谈国际人类和平、力求全球战略稳定，甚至大力消减核武、防备战略误判，而它们同时在建立自己的多层次、多强度的战备方案，发展更加迅捷、有效和多功能的武装力量，并且对中小型的“麻烦制造者”实施不间断的遏制、制裁和直接打击。“避免大震动”、“大国不开战”仿佛成为某种默契，哪怕它们之间有各种太极推手式的暗地较量和神经战层面的博弈，而局部战争手段和各种短促有力的军事解决方案受到更多重视，大国对中小国家和非国家势力的武力使用变得简单易行。当人们说“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主要特点时，主要是指大国之间无战事、世界大战可能性近乎消失，而绝非意味任何冲突绝迹和军事干涉不再的情势。国际冲突的另一值得注意的趋势是，在未来，随着信息手段穿透力的增强、传播过程带来的“放大”或歪曲现象的加剧，以及国际组织和地区性联盟干预能力的加强，一些传统上影响空间仅限于本国内部的骚乱与动荡，越来越有可能受到外部势力的介入和国际规范的强制，而外部因素又多半有相互对立的多种考虑与干预战略，从而使内战外溢、多边卷入的可能性大大上升。在新的时期，国家主权仍然是国家关系的基本原则和多数国家安身立命的法宝，但国际冲突的复杂因素，特别是强大国家的支配

意愿和国际制度的网络功能，会以各种方式约束有麻烦国家、受打击对象的主权权利；主权国家国内状况及特定地缘战略环境，从内外不同侧面决定着国家安全的水平和国家主权的强弱。

趋势八：国家内部治理的好坏、政府的责任与能力，越来越直接关系到各国的国际形象和权益；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的多层次博弈，将更加快速、有力地得以呈现。

前面讨论里已涉及对各国政府的治理能力的评价，牵扯到新时期国际关系的再认知问题。在传统教科书里，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基本上被认为是分立的、多半不相干的。信息技术和传播手段的不发达，国内法与国际法的不衔接，以及某些政府刻意的闭关锁国，相当程度上造就了这种两分局面。按照旧时的理解和实践，一个政府（及其精英）在国内干得再好，那也仅仅是内政的范畴，它（及他们）未必获得高的国际评价与影响力；反过来，一个政府哪怕在国内胡作非为，它（及其独裁者）也能毫无困难地保留联合国的席位和各种国际组织的投票权。也就是说，受到霸权时代（包括两极格局）维护的这种传统主权及其观念，与政府责任的履行及国内民权的状况无涉。时代在变化，国际关系也在进步。现在世界的多数国家和多数公众，已越来越能感受到上述两分法的失效。放长眼量，不难得出结论，即：随着多数国家和整体国际社会的进展，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岂止是不可分割，前者简直就是后者的放大与延续。一个国家不论采用什么样式的体制，重要的是国家当局能否保持经济和福利的可持续增长，保证政治与社会的建设性（和谐式）稳定，

保障人员、物流和资金的公平有效配置。借用眼下中国人常说的一句话，要以“老百姓满意不满意”，作为最直接最重要的评价标准。凡是达标的政府，它在国际上说话就硬气，国家主权和安全就更有可能获得保障，这种体制的延展力和内外弹性均有可能超常发挥；而那些鱼肉百姓且蛮横无理的政权，哪怕天然资源丰富、地理位置优越，它对外宣示的信用也会被国际社会打折扣，甚至出现被强制剥夺主权权利（即使是一部分主权）的后果。萨达姆时代的伊拉克，就曾经有过被联合国设置“禁飞区”的严厉场景。众所周知，美国和少数西方国家在制裁伊拉克问题上也做了手脚，以谋取不可告人的战略利益。但“苍蝇不叮无缝的蛋”，没有萨达姆的专制野蛮，不会有西方强权的霸道介入；伊拉克那一段的悲惨遭遇，是这个国家内部恶政与外部强权双重作用的结果。我们也不要光看到美国国际上经常行用霸力，在某种程度上那是以美国国内体制对其百姓的善道为前提的；如果美国国内民主、民生、民权的任何一方面出了大麻烦，如果美国公众不高兴、不支持，哪怕“五角大楼”再添几个航母编队，“山姆大叔”恐怕也不会有现在这种全球干涉的底气。还必须指出，国际政治并非简单复制国内政治，前者的复杂博弈和反向作用也在改造、塑造、影响后者的内涵与方向，信息传播和全球化的其他手段仅仅是使这种过去不那么凸显的双重博弈变得更加有力、快捷、显化罢了。还是以那个超级大国为例：表面看，布什主义直接造成的是美国的国际失败（公信力大幅下降）；深层次观测，它也严重挫败了美国的民

（下转第 21 页）

美元贬值引起其他国家货币贬值的连锁反应，日本、瑞士、韩国、泰国等相继出手干预汇市压低本币汇率，“国际货币战争”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 西方恐华、妒华心态日益明显，负面涉华论调层出不穷

### 一、“中国模式威胁论”进一步抬头

比利时根特大学教授德沃斯指出，经济危机催生了一场更具根本性的危机，即“国家资本主义”的兴起，代表国家资本主义的中国模式对美式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模式产生了根本威胁。加拿大《环球邮报》则指出，世界不再是纯粹国家之间或纯粹市场之间的竞争，而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国家和市场结合方式之间的竞争，在这种竞争中，中国式国家资本主义者逐渐占据上风。在西方政界学界日益感到中国模式威胁的背景下，西方转而追捧印度模式，企图在发展中国家树立符合西方理念的样板。美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萨默斯高调提出“孟买

共识”，声称在“孟买共识”和“北京共识”的长期角逐中，“孟买共识”将最终胜出，并在2040年前后超越“北京共识”。

### 二、美西方抛出“中国傲慢论”、“中国强硬论”、“中国自私论”等一系列负面涉华论调

随着近期中美、中欧在气候变化、汇率政策、人权等领域的矛盾和摩擦加深，西方舆论将一系列问题归咎于中国的“日趋武断”、“狂妄自大”、“咄咄逼人”。英《每日电讯报》指出，中国严重误判了全球力量对比，“一心想与美国一决雌雄”。欧洲改革中心主任格兰特则指出，中国对自身的成功过于自信，因而才会在外交上更加武断。对中国在对台军售、西藏问题、谷歌事件、毒贩事件等问题上的表现，日、英、法等媒体通常用“恶狠狠”、“硬碰硬”等词汇加以描述。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则表示，中国已经放弃了邓小平“韬光养晦”的外交指导思想。德国马歇尔基金会指出，中国在金融危机之后更不愿妥协，只关注自身内部发展而不愿意承

担更大的国际责任。

### 三、西方企图强行给中国定位，炮制中国“发达国家论”、“超级大国论”、“帝国主义国家论”

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提出，中国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已经从一个落后国家成长为发达国家，再过30年，中国将成为超级富国和世界经济盟主。英国专栏作家拉赫曼称，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富国，它坚持说自己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只是为了拒绝进行重大政治和经济改革。德前外长费舍尔认为，中国将成为一个主要关注国内事务的超级大国。英国中国问题专家马丁·雅克称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正在崛起的超级大国”。澳《悉尼先驱晨报》称，中国将制定自己版本的“门罗主义”，努力把美国赶出亚洲。美国防政策委员会委员卡普兰认为，中国已经开始和印度在印度洋争夺势力范围。日本学者渡边利夫把中国称为“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认为中国对外扩张是历史必然。■

(责任编辑：刘娟娟)

(上接第18页)

心与干劲，制约了美国的硬、软实力；“奥巴马新政”说到底，是以国内变革提升美国的体制效能，进而重振这个国家主宰世界的的能力。纵观当今世界，各国国家体制满足社会需求的效能及其适应时代变化的能力，决定着各主权国家在全球社会的安身立命状态，决定着各自的话语权和影响力的大小。越往前走，世人对此会看得越真切。(待续)

(作者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副院长)

(责任编辑：李瑞蔚)

[1] 罗伯特·基欧汉. 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 苏长和等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2] 庄贵阳、陈迎. 国际气候制度与中国.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5.

[3] 杨成绪. 国际大格局——对1992—2006年国际形势的观察.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6.

[4] 张浚生、史文. 中美安全危机管理案例.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7.

[5] 大卫·哈维. 新帝国主义. 初立志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6] 杰弗里·帕克. 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1992.

[7] 罗伯特·西格·马汉.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1989.

[8] Giulio Douhet. The Command of the Air. New York: Coward-McCann. 1942. // Alexander P. de Seversky. Victory Through Air Power.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42.

[9] 熊彼特. 经济分析史. 朱泱等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4.

[10] 约瑟夫·凯米莱里等. 主权的终结? ——日越缩小和碎片化的世界政治. 李东燕译.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1.

[11] 查尔斯·W·凯格利. 世界政治: 走向新秩序?. 夏维勇和阮淑俊译. 北京: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10.

[12] Hugh Seton Watson. Nations & States, An e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nations and the politics of nationalism. London: Methuen & Co. Ltd, 11 New Fetter Lane. 1997.